



# 生活在何处，文学就在何处

——访作家黄传会 □丛子钰

黄传会是新中国同龄人，他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这里因为盛产明矾，被称为“世界矾都”。父亲1966年病故，母亲将清贫如水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先后将自己含辛茹苦养育大的5个儿子全送进部队，充分展示了一个普通母亲的家国情怀。黄传会的家也成了小镇上的“军人之家”。

20岁，黄传会应征入伍，到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成为了一名炮兵，隔海相望便是蒋介石军队驻守的马祖列岛，前线时局剑拔弩张。黄传会说，“当时我在连队当文书，那时候年轻，有激情，诗歌、散文、小说，比如《高高昂起的炮口》《哨兵》等，还有说唱小节目，连队黑板报上，后来给《人民海军》投稿，记得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高高的石阶路》，在《人民海军》报上发了一整版。”

1972年，黄传会得到连队推荐，成为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工农兵学员。3年半的大学生活，收获最大的是读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为以后的专业创作打下了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福建前线老连队当指挥排排长。1977年，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恢复，急需补充年轻人，28岁的黄传会再次被命运选中，从福建调到北京，成为一名专业文学创作人员。

“当时海政创作室实力雄厚，名家集聚。有写过长篇小说《水下阳光》的王恺，写过《水手长的故事》《灯塔风雨》的高原，后来还有写过《甲午风云》《巴山夜雨》《傲雷一兰》的叶楠。在他们面前，我是一位文学新兵，虚心向老前辈学习。高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灯塔风雨》，非常有影响。他告诉我，为了写这篇散文，他把东海的灯塔站都访遍了。那时候交通不便，去海上灯塔站非常不容易。这给予我很大的影响和启发，这些老作家教我如何面对生活、深入生活。”

1990年代以后，黄传会开始专攻报告文学。他下决心把万里海疆所有有海军驻守的岛屿都跑一遍，之后从旅顺口，到烟台、青岛、上海吴淞口，浙江舟山群岛，福建沿海，广东汕头，海南榆林，一直到西沙群岛，他基本上都跑遍了。海岛的生活是寂寞的，他提到旅顺口外有一个叫圆岛的小岛，岛子很小，上面有海军一个观通站。岛上没有土，干部战士利用出差探家的机会，带回了一袋袋一箱箱的土，填筑了一小块一块的梯田，种上了菜蔬，被称为“一把土精神”。

“我还去过河北兴城外面的小山海岛，那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靶场，上面只有一名守岛战士名叫蔡德咏，他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坚守了10年。孤岛十春秋，有多少汗水与枯寂？我在岛上待了3天就有些受不了了，可他一待10年。后来我写了篇短篇小说《设有靶标的小岛》，八一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电影《天涯并不遥远》。”

海军是个多兵种军种，包括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岸防部队，还有观通雷达部队等，执行各种任务，生活丰富多彩。跟随驱逐舰巡逻海疆，跟随潜艇在水下远航，跟随破冰船到黄海破冰，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富矿，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一次，跟随北海舰队的一艘潜艇在水下航行了8天，在那个不见阳光、呼吸的是再生空气的狭窄空间里，黄传会感受到了什么是忠于祖国、什么是奉献精神。

长期在海军工作、生活，必定会思考这支军队的历史。中国海军历史，从清末北洋海军成军算起，经民国海军，到新中国人民海军，三个历史阶段，近100年。黄传会与创作室战友张帆合作，十年磨一剑，创作出了中国海军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

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军纪实》，百年历史，百万字长卷，百余次悲壮海战，百余位英烈人物，用报告文学笔法记录、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黄传会谈到创作这3部作品的不易和对他本人的震撼时说到：“写这部作品最深刻的感悟就是使命担当，中国海军历史是一部悲壮艰辛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反抗外强入侵，为了复兴中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是应该载入史册的。特别是《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记录了从1949年人民海军诞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海军培养起来的作家，应该有责任担当的气魄，应该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要耐得起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同时还要投入最丰沛的情感。这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体会，不说别的，光浩如烟海的资料，我们的阅读量就是以千万字计算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必须有理想信念，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生命力，如同没有灵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在书写历史，同时也在书写精神。”

黄传会在为海军修史立传的创作中，认为“一头一尾”是重中之重，海军的“一头”是指初创时期的五年，这5年是人民海军70年历史进程中打基础的5年，是关键时期，是出精神力量的5年。“一尾”是指最近10年，这10年是人民海军跨越发展时期，有了环球航行，有了亚丁湾护航，有了航空母舰，大长了军威国威。《中国海军：1949—1955》，写的就是“一头”的故事，黄传会用近半年的时间，扎入海军档案馆。每天一上班就进馆，下班最后一个离馆，翻阅了大量史料，把初创时期的电报文件都通读了，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然后，到海军的一些干休所去采访健在的老海军，请这些亲历者口述活的历史。历经3年，终于完稿，海军初创时期产生了许多人民海军的宝贵精神，比如，艰苦创业、勇于牺牲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这些今天依然“活”在海军部队中的精神，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并被逐步发扬光大，成了人民海军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黄传会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社会民生题材，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教育子女调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接触希望工程这个题材的机缘要追溯到1990年，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当时，全国贫困地区每年有五六百万的孩子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学、辍学，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救助工程。很巧，实施这一工程的秘书长是他的温州老乡徐永光。他对黄传会说：“写写我们希望工程吧，贫困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孩子上不起学，你们作家应该为这些苦孩子呼吁呼吁！”当时黄传会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春节刚过，他就走进了离北京不过一二百公里的太行山区。在那些低矮的土房里，很多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阻隔在校门之外。接着，黄传会开始了一次艰难的采访，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又从大西南到大西北，足迹抵达7个省（区）的20多个贫困县，写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这部作品。他在书中写了广西平果县汤那屯5个失学女孩的悲凉故事，



后来，这个小山村收到了26万元爱心善款。村里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希望小学，修起了一段公路，架起了几公里的输电线，彻底改变了山村面貌。村民们感激地说，是北京的一位海军作家，使山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黄传会听到后感到十分欣慰。

对报告文学文体，黄传会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报告文学是种非常独特的文体，首先它必须是真实的，它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虚构、去编造、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在真实的前提下，创作出有思想性灵魂和艺术性气质的精品力作，的确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是需要下苦功夫和硬功夫的。选题本身就是对作家“文学综合实力”的第一轮考验。每个时代，总是存在一些让人们最为焦虑和痛苦的问题。这种包含着时代重大问题的题材，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新时期以来，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钱钢的《唐古大地震》、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等，都是“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前行方向。

此外，黄传会坚信“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必须扎扎实实深入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剧烈的变迁之中，波澜壮阔，泥沙俱下，这种“剧烈的变迁”，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只要作家真正贴近生活，便会发觉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如同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现实远比虚构更为神奇”。

报告文学曾经是记录时代最直接、快捷的方式，但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微信、博客、视频的利用，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空前的畅通，这对报告文学创作是一种严峻的挑战。黄传会认为，面对时代带给报告文学的难题，作家应该积极面对。

“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写作，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须见思想高度、深度，还必须有艺术感染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而这两者又必须靠文学手法来实现。因此，我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看得特别重。报告文学不必跟新闻抢时间，恰恰是等新闻‘热闹’过去以后，报告文学可以向‘广度’和‘深度’进发。”

面对波澜壮阔的新时代，黄传会的选择依然是迈开双脚，走进生活。他说，时代在前进，报告文学作家要有紧迫感，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现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和担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生肖属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时刻，心情自然格外激动。

我出生在浙江绍兴市曹娥江边的一座古镇：上虞章镇。我是喝曹娥江水长大的。曹娥江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但一定知道剡溪。唐代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吟唱道：“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这剡溪就是曹娥江的上游，而且正好以我的故乡章镇为界：章镇以上为剡溪，以下为曹娥江。

章镇虽小，但出过好多位历史文化名人。一位是东汉哲学家王充，距小镇数里的滨筑茶山上至今还保存着“王充墓”。再一位是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始宁墅中的“北山别墅”，据就在我们小镇的姜山东南。小镇距绍兴老城区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和我外公家一个台门里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前当过小镇的小学校长，他曾是鲁迅先生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我的故乡应该是一个“人文渊薮”之地，但说来惭愧，故乡所有这一切与人文有关的事儿，都是我上了大学以后才弄清楚的。我的父母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在我所知的亲戚中没有人读过中学。

说来或许使人不信，在我的童年时期，没有父母的概念与记忆，在我出生之前，父亲为谋生去了很远的一座城市，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独自一人去父亲那座城市探亲，从此就留在了那座城市。我是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跟随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20岁，我才第一次来到父母扎根的那座城市，第一次见到父母还有我的4个弟弟。当我听弟弟们说他们经常煮一锅咸萝卜汤下饭时，我完全理解了父母为什么要使我成为“留守儿童”，完全懂得了父母的苦楚和不容易。虽然我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的童年，但我却有在祖父母点点滴滴雨露滋润呵护下长大的童年。同时，使我从小无师自通地懂得了自立、自强的含义与紧迫性。如果没有我“留守儿童”式的童年，我想我不可能有定力与勇气走向青年，走向人生的每一段岁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校教学与文学读物，使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养成的重要素质一是诚实，二是勤俭，三是热爱劳动，有了这三种素质，人生就足够强大。因而，童年对于我是人生的最大馈赠，生命从童年出发，童年的岁月已为人生定格下了永远激励生命向上向善的坐标。

我16岁初中毕业后，先是上山下乡当“知青”，在距故乡30多里的复厄山区当了实实在在的两年半农民，学会了插秧、耘田、种菜、砍柴，挑130多斤柴担走30里路气不喘。在农村，我同时还是一位称职的生产队会计，管理着全队上百口人的吃喝拉撒。由于勤劳自励安心务农，我被评为全县的“优秀共青团员”。19岁我应征入伍去了南京军区部队，“一年新（兵），两年老（兵），3年背背包（退伍）。”当了3年真枪实弹的军人，红五星红领章，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再以后，我在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与重庆铁路分局重庆机务段当了货真价实的7年铁路工人，先在铁路机务段运转车间当火车司炉与副司机，以后在设备车间当机械钳工。

遥想当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我与师傅拉的不是上千位旅客就是几千吨货物，“安全正点，多拉快跑”是机务段人人时刻遵循的规章与

## 岁月如歌孺子牛

□王泉根

目标。虽然火车司炉的高强度劳动（当时每月48斤定量还不够吃）与高密度上班非常人可以想象，但一想到汽笛声中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的列车，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建设日夜奔忙，作为火车司机的自豪感至今依然荡漾心头。“铁老大”的感情使然，因而我后来凡出差去外地，能坐火车就不乘飞机，特别是现在有了高铁动车，真正是风驰电掣，想起当年汗流浹背当蒸汽机车司炉的情景，如今舒适地坐在高铁车上，真是一种难言的享受。

从我的学历（初中）和履历（农、兵、工）看，我做梦也没想过要从教与做学问。1977年年底的那一场“高考”改革，使我有幸赶上“末班车”，以初中文凭、铁路工人的身份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在全国570万考生只录取27万人的5%录取率中，有幸胜出，成了“77级”本科生。

更感谢当时国家的好政策，我入学报到时只用交5元钱的讲义费就读了4年大学，我读大学期间同样计算为工龄，不但不用交一分钱的学费与住宿费，而且原单位工资照发（每月38.60元）。因而尽管当时我已有家室之累，但我全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为衣食银两操心，使我能全身心投入学习。本科毕业后考取硕士研究生，按当时的政策，我可以享受比原单位工资要高的研究生津贴，因而又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学而优则报效祖国”，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多数人的价值取向。

回顾我16岁后的经历，不禁感慨系之，戏称自己是“越活越小”：最初是上山下乡当农民“伯伯”，以后参军成为解放军“叔叔”，退伍后成了铁路工人“老大哥”，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居然考上大学又当了“学生”。从伯伯化身为学生，你说是不是越活越年轻，越变越小？

我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在我30余年的从教与学术生涯中，我是一位纯粹的教师与学者，一直坚守在讲台，潜心于书斋。因我生肖属牛，我将书斋命名为“潜耕堂”，既是自励自勉，也是实情实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使我这一个连做梦也不会想过要读大学的初中生，居然成了‘77级’本科生，还成了大学教授，而且是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教授。命运将我安排在高校教师的职位，可以说，自从接受这一使命以来，我是兢兢业业，如牛力耕，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懒惰——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北师大教授’这一职位。扪心自问，我是敬业尽职的，对得起我的学生，我的学科，我的学校，我深爱的祖国。”

七十春秋，岁月如歌。深深地祝福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愿为祖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与文学研究鞠躬尽瘁，做一个如同我们绍兴老乡与先贤鲁迅先生所说的“孺子牛”。



我学写诗，是七八岁时，听乡民唱民歌开始。那时挑粪上山种包谷（玉米），要上很高的山，我也就懂了民歌的高度。还有就是听《薅秧歌》和《哭嫁歌》等，一是让人心情像不苗儿青青，一是让人感动得跟着流泪。关于“押韵”，是人站这山之上——“呵嗨”，那山就从深谷回音一声“呵嗨”。真是意味深长，余音缭绕。再就是农村的谚语，听起来顺口，于是跟着编，跟着哼。那时读小学三年级，还有顺口溜发表在校园的墙报上，老师说那是诗，还在县里获过奖。其实，什么叫诗，自己并没弄清楚。但是，这也成就了我后来随口就是诗：“带一亩月色下酒，脸红就日出；夹二两两清汤，月就到故乡”。

上世纪50年代的中晚期，学生读书就是课本和作业，没任何课外读物。如果说还有，那就是山里跑步的一阵阵风，禾苗在赶忙抽穗，豆藤在抓紧攀树。上山砍柴、割草，见识的真是：“高若矮至一块石头，是山高；贵若贱至一

柴老木，是金贵。”为什么？因为实用。也因此，我从初学写作到年过70，一直不敢争高。小时候，挑粪上高山太累了，也不愿强出城，山里走夜路，会被草丛内窜出的毒蛇咬伤。但我知道，我们脚下还有蚂蚁的天下，再下是蚯蚓的家园。人已高高在上，还想和天比，须知阳光也只是正午才公正。遭遇早晚霞红雾罩，又是每个白天需经历的。所以，我坚信时光闪耀，岁月就像岩畔古树沐风栉雨，甚而雪压霜欺。人，往往不如一株草，草今冬黄了衰了，明春还会发芽，人死了不可能重来。

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诗，还是考入县里中学，从图书室借来读的诗集方知：诗人，应以宽容为尚。到初中末期时逢“四清”和“文革”，虽然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文，也只是摸索。也许是顶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压力，做事写作都特别认真，相继又在省刊和《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到1979年2月叙事长诗《呼声》在《诗刊》发表。那之前，我称之为

## 站稳“人”字

□李发模

“过去的到达足脚疼”。改革开放，1984至1988年相继到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作家班进修学习，出版了《魂啸》系列和《这个世界与我》等，到“另一种到达是腰酸”。出名之后的“脚印古道坐车船、飞机，其过程的同与不同，个人的行程，亦如同共和国的历程。”

古今是双胞胎，从母怀至脚下泰山，而今是飞船去外星系。我呢？2009年从遵义市文联退休之后，因冠心病动过手术，每天一肚子的中西草药。见这时代发展得越来越好，总想多活些岁数，多见些新的变化。所以暗自告诫自己：鹰不在空中停留，浪

不在河上停留，时日不停留，自己，就一切应在行进中……我总是感到新的时代有一双神秘之手在推动着这乾坤，两脚追走心，运行中的这个星球，和我们的身心不应以退休为分界，还活着，就要不舍昼夜。

而今老了，我仍没停笔，依然坚持创作。一是像抽烟，有瘾，防脑痴呆。二是这时代太值得大书特书了，尤其是到贫困山区采风创作，去山水间呼吸生态环保或抢险救灾。只要叫到我，我都要力争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把70岁当作17岁，每天还像学生一样练笔。

以下是我以诗的形式的学习记：

### 一

阳光列队搜寻寸心之起因  
历程的路线图突破云雾  
图腾，一张面约约定东升  
照眼波赧赧

那是爱的故乡啊  
天人合一的疆域

### 二

母语去新的空间对话灵魂  
耳边掠过，眼前荧屏，嘴上未知  
忧伤在异乡，有个个似浪浪大  
好怕上刀叉的餐桌

### 三

进山，水是人旅伴  
上山，野径训练双脚  
在云盘盘旋

### 四

约夕阳与之一起，去和星星下棋  
弦月认为错了，如镰割出一条路来  
挂悬崖峭壁

凉风骑马而来，飞瀑执戈  
朦胧统领的鸡鸣三省  
曾路过一九三五，黎明一九四九  
在天安门城楼上  
站起共和国……

我，作为一个诗人，就是别丢失了  
来历。诗歌是人来历的对视与展望，懂  
食色之撒捺就要站稳“人”字。